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与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编委会主任委员 胡福明
责任编辑 陆剑杰 张一兵

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 理论的哲学基础

编 委 会 胡福明
主任委员
责任主编 陆剑杰 张一兵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胡福明,
陆剑杰,张一兵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6(2000.4重印)

ISBN 7-305-03157-7

I . 马… II . ①胡… ②陆… ③张… III .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研究-文集 ②邓小平理论-研究-文集
IV . ①B0-0②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372 号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编 委 会 胡福明

主任委员

责任主编 陆剑杰 张一兵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375 字数:503 千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1—3500

ISBN 7-305-03157-7/B·177

定价:28.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胡福明

委员 (依姓氏笔画为序)

孙伯鍨	刘道镛	江德兴	任 平
陈安吉	陆剑杰	张一兵	李明华
林德宏	周 直	胡福明	涂成林
黄文虎	崔绪治	贾 珍	虞友谦

序 言

胡 福 明

1995年金秋十月，我国哲学界老中青三代知名学者，为纪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写作150周年而云集南京，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为主题，开展了具有理论深度与现实价值的讨论，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最受重视、最具代表性、学术成果最大的一次讨论会，展示了自1978年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概况，展望了跨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其意义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南京十月讨论会主要论文的文集，只要看一下代表着各种不同观点的37位作者的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哲学文献。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形成的标志，是一场空前深刻的哲学革命的宏伟产物，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泉源和范本。

众所周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于以马克思命名的哲学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似乎有些奇怪，都站在马克思的旗帜之下，彼此间却发生了和发生着重要的争论。一些学者强调，哲学是宇宙观，是对于世界的一般本质的说明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它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辩证的发展观，因而，以“辩证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确切不过的；另一些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唯物主义传统又超越了这种传统，确立了社会实践的科学观念，它的新世界观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现实感性世界为其说明和改造对象的世界观，因而“实践的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学者，从实践的观点入手，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是崭新的哲学人学，它的指向是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因而，“实践人本主义”才是这一哲学的真正指称。此次南京十月讨论会上，这三种观点的哲学家都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更加明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按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彼此真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上述不同意见在 1978 年以后的凸现，主要源于对 150 年来人类实践发展和哲学发展的不同视角的审视，特别是对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践发展和哲学发展的不同审视。因此较之过去的“无异议”，自觉发生的分歧乃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我们相信，以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践为基础，以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中的哲学原则为指导，我国哲学界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精神和基本内核在理解和阐释上达成合理的整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跨世纪的发展。毫无疑问，在这种整合中，本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和时代精神将得到充分反映，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将会坚持，科学实践论的核心地位将进一步强化，人及其世界历史性的发展将会合理地得到说明，而人类的自由和解

放事业将会更清晰地呈现在哲学的视野之中。

下面是这次讨论会上探讨的几个主要论题：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这是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基本精神和社会功能的大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部新唯物主义的纲领中，早已指明实践的观点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与会的哲学家们用不同的哲学语言表明了这样一种共同的见解：说“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好；说“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关键、最重要之点”也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是把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感性现实世界作为对象”也好；说“唯物主义传统在马克思视野中转换成为一种研究现实世界的方法论”也好；都是在阐明同样的观点，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坚持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或者说“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是被确认的，但它已提升到承认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客观性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基础地位的新高度。

应该说，对于实践论的核心地位的理解，已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部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所证明，尤其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如龚育之同志在他的发言和论文中恳切指出的，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深入地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深刻地说明，理论和政策的客观性问题，或者说外部现实世界的独立性或客观实在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人在实践中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唯物主义立场的坚持，一点也不能离开人的社会实践。1978年以来，中国这个

客观现实世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面貌，确切地说，它是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被不断地创造着的现实世界。在自觉意识上，把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与把握实践条件的客观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被提到哲学理论的中心位置，用以指导我们的创造性实践。这难道不是深刻说明，唯物主义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以实践为深刻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正在于改变这个现实世界。

第二，关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与实践理论的具体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既是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学说的批判继承与科学总结的产物，又是按照唯物主义基本要求，考察人类生活的经验事实的结果。这里，理性的抽象来源于感性的具体；这感性不仅是感性的对象，尤其是感性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建立，其意义在于指导我们去研究和把握现实主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从感性的抽象再上升到理性的具体，并且最终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了“具体实践”的范畴，这是非常重要的。如同没有“运动形式”范畴就不能真正理解“动运”范畴一样，没有“具体实践”范畴也不能真正理解“实践”范畴。这次讨论会上，人们提出并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

——实践的历史性。人类社会实践是作为历史过程展开的。社会实践的基本积淀是社会生产力，实践是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也相应地发展。所谓“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就是从社会生产力视角看待的社会实践的诸历史阶段。同时，在社会换型时期，实践也是分阶段展开的，有以变革上层建筑为主要实践形式的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阶段；有以变革经济基础为主要实践形式的经济革命或经济改革阶段；有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主要实践形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阶段。实践具有历史性，实践观念也具有历史性。观念与实践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是具体的，又是历史的。移用旧的观念来规范新的实

践，势必导致实践的失败。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业已建立起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把改革社会基本制度的阶级斗争实践放在至高无尚的地位，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由于抹煞了实践的历史性，犯了极大的错误。具体地把握具体的实践，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也是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

——实践的文化性。实践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观念和意志的物化过程。观念和意志在实践中产生、校正，又在实践中外化和对象化。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观念的积淀过程，在长期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构成广义的文化。这样，实践就具有思想性和文化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作为其核心的实践论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研究它们的渊源和潮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研究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同时，也研究文化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努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是极其重要的研究任务。

——实践的规律性。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实践的规律性有其普遍性方面和特殊性方面。作为人类生活的一般实践，以其客观必然性成为若干普遍规律，它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全体上和全程中都起着决定的作用。凡实践，都存在静态的结构性规定和动态的过程性规定。就前者而言，实践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性之间，实践的智力因素和体力因素之间，实践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之间，实践的主客体关系和主体际关系之间，实践主体际的横向集团关系和纵向层次关系之间，都需要研究它们的客观必然联系，从而揭示实践的一般的普遍规律；就后者而言，实践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之间，连续性和间断性之间，量变过程和质变过程之间，诸实践基本形式之间（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以及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技术的实践等），又都存在着纵向的客观必然关联，也都需要加以研究，以便揭示实践运动的普遍

规律。“实践”与“具体实践”相对应，“实践的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的特殊规律”相对应。以“实践的普遍规律”为指导，进一步研究特定时空界域内的具体实践的特殊规律，用以指导具体实践达到成功，这也是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正如黑格尔有“绝对必然性”与“相对必然性”的区分那样，实践规律当然也就有“绝对规律”和“相对规律”之分。实践特殊规律是相对规律，因而必须研究派生这类规律的“实践的初始条件系统”，研究初始条件系统中包含的“客观可能性空间”，研究实践主体从自己的价值要求出发对这一可能空间的选择，研究初始意志在实践检验中的校正和外化。这些，都是崭新的研究工作。

其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南京讨论会的主题定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个主题反映了我国哲学界的重要共识：一是肯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个在唯物主义科学传统基础上产生、又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抽象对立的新哲学理论是这两部奠基之作的理论核心；二是肯定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是研究正指导着我国新时期实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三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问世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具有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应用，另一方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顽强生命力的确证。

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需要作双向的努力。一方面，我们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进而寻找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哲学精神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显现以及它在其中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研究这一理论的体系和一整套基本观点，追溯这

些观点在哲学上的根据。在后一方面有两项最为直接的工作。一项是展开对邓小平所阐明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哲学论证。在邓小平那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前者着眼于摆脱思想束缚，但目的仍在实事求是；后者着眼于新情况的研究和新问题的解决，但前提必须解放思想。二者的共同立足地是社会实践。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判决是非的“最高法庭”，这才能克服盲目崇拜权威和陈规的非批判态度，勇敢地面对新的现实；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为正确思想的源泉与动力，这才能真正从无经验到积累经验，从非理性到理性，从现象的认识到底质的认识，从反映到规划，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邓小平那里，高扬主体能动性和尊重实践条件和环境的客观性是统一的。邓小平提出的敢试、敢闯、敢冒的精神是以发扬人民的历史主动性为前提的。我们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实践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模式可供利用，在这种条件下，唯有大胆投入实践，放手让人民去创造，在实践中见分晓、创经验、形成政策体系和科学理论。但是高扬主体能动性是与严格尊重、深入考察实践的现实条件和环境相统一的，主体能动性的一个基本规定就是能动地把握和利用客观条件和环境。从这个统一中可以透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改造和创造世界，由此，他们视野中的世界乃是人在其中活动的世界，是以特定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世界，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相互作用、双向改造的世界。唯有这样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产生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尊重主体实践活动的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原则，产生正确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那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和真理论也是统一的。价值论是从主体方面来研究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主体性理论，同时又渗透着客体性；真理性是从客体方面来研究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揭示呈现在主体面前的客体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作为二者之统一的现实。因此，价值论与真理论

的统一，是主体能动性与客体条件客观性相统一的理论表现。邓小平非常重视价值论，认为正确地选择和确定价值原则是规范实践，使之少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的基本前提。邓小平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最具确定性与指导性的乃是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是以真理论为基础的，但直接的内容则是无偏颇的社会主义价值论，它对于我们的开创性实践活动具有严肃而重大的导向意义，要求我们朝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开展改革、开放、建设的实践。从邓小平的价值论和真理论相统一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发现他的全部思想的轴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践论。另一项工作是研究邓小平的辩证思想方法和决策方法。人类的辩证观念开始时来源于对于自然界的总体直观，这种直观往往是同对人自身及其生活的辩证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后，来源于自然科学成就所显示的辩证性，同时也来源于人类实际生活及其演变中所显示的辩证性，二者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在现当代，辩证法继续发展，由于人对于自身实践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决策、设计、规范活动广泛展开，辩证法的实践基础更加深厚。如前所述，实践自身是有规律的，成功的实践和失败的实践其实就是合规律实践和反规律实践，就是合辩证法的实践和反辩证法的实践，人们正是从这样的实践比较中，建立起客观的辩证法，进而形成思维的辩证法。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为决策的辩证法，同时也就表现出思维的辩证法的力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各项重大矛盾的基本方针。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确保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也会出现许多消极现象。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是根据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价值矛盾提出来的，是能动地扬其长、抑其短的实践指导方针。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上是统一的，同时也在发展顺序上，力量的分配上，效益的不同性质和实现方式上，存在着矛盾。两手抓，就是反对片面性，防止矛盾诸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强化起来，就是要恰当地处理和消解这些矛盾，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在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实践中，已经提供了许多辩证法的启示。辩证法的思想深入在社会实践之中；离开社会实践，辩证法至多就是某种辩证的直观而已。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论述了“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把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与当前改革、开放、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从而把这一思想推向前进。我们学习研究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必须同时学习研究江泽民的讲话精神。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一理论正在指导着我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邓小平的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生机勃勃的；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在中国经历着一个生动活泼的发展过程。我们没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抱悲观态度；只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发展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的事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一定具有牢固的地位和光明的前途。

中国哲学界有许多同仁，正在谈论着“哲学的贫困”、“哲学的失宠”、“哲学的困境”。对这些判断需要作科学的分析。恩格斯说过：哲学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它同经济基础的联系及相互作用必须经过“一些中间环节”，以致显得“混乱”和“模糊”。这是人们容易轻视和忽视哲学的认识根源。因为这一点，在我国当前条件下，许多人便认识不到哲学对于我们事业的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

急功近利的思想急速地流行起来，不但各个市场主体都在为生存、发展而奔忙，而且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也在为每天摆在面前的无数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而大伤脑筋，人们无暇过问那些从根本上起作用和长远地起作用的事业。这是人们轻视哲学的经济根源。因为这一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热心人和参与者减少，经费紧张，活动条件滞后，难免使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感到艰难。可见，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用”，不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需要哲学，不在于一般群众对哲学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作。我国哲学界必须付出艰苦努力，研究、阐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好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评析工作，把哲学精品和大众需要的哲学营养奉献给人民。尤其必须扎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把实践的丰富经验教训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思考和总结，阐发邓小平理论的深厚哲学基础和深刻哲学蕴含，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有用哲学成就，写出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表现当今时代特征，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哲学著作。哲学研究无论是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审视还是对于基础理论的哲学考察，都有一个深思阶段，都需经历很长的过程，而其成果要变成物质力量，更需经过许多的中介环节。哲学研究这种精神劳动的特殊性，要求哲学工作者甘于寂寞，甘于清贫。但是，党和国家应当理解哲学工作者，应该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研究条件，准备付出长期的努力以至几代人的努力，来建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哲学。

中国面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的艰巨任务，这个创新过程把大量哲学问题提到人们面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得那么强烈，这给科学历史观提供了活生生的实践根据。市场主体正遍及中国城乡，人的主体性在市场运作中获得了新的规定。这就要求人们研究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和主客体关系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人际关系的大

变动，是具体人性的重塑过程。人学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根据，自由、平等、博爱、人权问题不仅具有阶级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能找到它们的某些人类性内容规定。市场过程的辩证法极为丰富和独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计划性质的宏观调整的矛盾，富有阶层和非富有阶层的矛盾，需要人们去处理，也需要人们去总结，从而为辩证法增添新的内容。市场经济机制的非基本制度性质，使我们对于社会经济结构问题作新的思考，由经济范畴区分为中性范畴和极性范畴，进一步寻找矛盾结构问题的新概括。

中国面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这里提供的哲学课题同样是崭新的和丰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结合是极性范畴和中性范畴的结合，那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当也存在相似的情况。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同时，它的操作方法和具体形式，也会具有某种非基本制度性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相应的，同构的，但又各有某种特性。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既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要使人民中的各阶层、各利益主体具有各自的应有地位和民主权利；既要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保证国家的必要集中；既要使政治和企业分开、政府和国有资产分开，又要保证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必备权力。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辩证法问题。

中国面临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和重塑中华民族新精神的艰巨任务。我们民族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这个现代化过程，不但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立创造过程。这个新文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因而是科学的；这个新文化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因而是大众的；这个新文化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因而是民族的。研究中华民

族新文化的哲学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建设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基本规律问题；二是文化内涵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文化诸形式的哲学问题。在前一方面，纵向上有中国古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前两种文化对于现代文化而言都是民族传统，这就引出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和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横向，则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这里提出的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后一方面，哲学、伦理、文艺、宗教、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等，都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些研究课题与研究任务，当然是举例式的，但仍足见中国哲学的大有可为，足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功能和生命力，足见中国哲学工作者面临的繁重责任。我们相信南京十月讨论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讨论，有助于明确跨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有助于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各项基本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团结和合作。这也是我们出版这部文集的命意所在。

（作者：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目 录

序言 胡福明 (1)

第一部分 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科学精神.....	龚育之 (3)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哲学基础.....	萧 前 (13)
论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黄楠森 (24)
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论马克思《提纲》和《形态》所实现的哲学	
变革的实质.....	高清海 (37)
关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徐崇温 (52)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孙伯镁 (63)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特征的再认识.....	辛敬良 (82)
“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鲜明旗帜	陆剑杰 (97)
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本体论意义	吴晓明 (119)
让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阴影中走出来	俞吾金 (144)
从《提纲》和《形态》看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	
的实质	王金福 (153)
“高清海难题”解	丛大川 (172)
是物质创史观，还是实践创史观	孙 品 (189)
实践：一个过渡性的逻辑范畴	
——对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再思考	仰海峰 (201)